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陈世

卷



结缘：文学与宗教

——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



DANGDAI

ZHONGGUO

WENXUEXUEJIA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陈世卷

结缘：文学与宗教

——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缘：文学与宗教 / 陈洪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ISBN 978-7-303-10389-8

I. 结… II. 陈… III. 古典文学—关系—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I206.2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709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 mm × 235 mm

印张：31

字数：450 千字

版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李音祚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凤凰世纪大讲堂访谈： 文人与佛教之缘 (代前言)

阿忆：几年前我看了一本书：《浅俗之下的厚重》，它的副标题是“小说·宗教·文化”。没想到宗教和小说会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南开大学副校长陈洪先生，讲演《佛教与中国文人》。陈校长，请坐。我看到您的简历：陈洪教授，1948年生于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1968年去山东下乡务农，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读研，1981年留校任教，十几年后做到现在副校长这个位置。没有错误吧？由简历我想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务农，是不是苦不堪言？

陈洪：那倒不是。首先，说“务农”是广义的，就是我在农村生活，实际上我真正在农田里劳动大概是两三年，后来就教书，到公社机关，还做过中学排球队的教练，做过农村医生等等，生活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阿忆：两三年的劳动也可以把人累垮，您是知识分子呀。

陈洪：我虽然算是个读书人，但是我的身体很强壮，特别是我的意志可说尤其坚强。那两三

年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吧。劳动之余，没有干扰地静下心来读了很多书，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阿忆：您不会是做了副校长以后，不好说自己当年特别苦，然后说那个时候您很乐观。是真的吗？

陈洪：这个嘛，我想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一个是当地的老乡，我想没有人看到过我皱眉头；另外，我在天津有很多朋友，每年回来见面时他们都挺惊讶：“哦，你在乡下的生活好像比我们在城市里还舒心似的。”另外，我当时还写了一些小文章，也有几首小诗，例如七零年登烟台山写的“神州须健者，大块待文章。独自凭栏处，天高看鹰扬”。好像情绪还可以嘛，呵呵。

阿忆：我发现皱眉头的人，一般是额头上面的皱纹特别多，您上面只有浅浅的两道，而眼角皱纹倒是不少，这是笑出来的结果。我还听说您当时十年农村生活，自以为最棒的是做赤脚医生。好多在农村做赤脚医生的人，练习打针都是拿自己练，把自己打成筛子眼儿。

陈洪：我当时主要是中医。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差一点就报了中医内科学。当时，我的中医是“全活”，其中包括针灸。我练针灸不是把自己扎成筛子眼儿，是扎成刺猬，身上到处扎上，体验针感。当时也算是那一带的小名医。

阿忆：您刚才提到了险些考中医的研究生，提到了研究生问题，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看了您这个履历，发现您没有上本科的经历？

陈洪：文化革命开始了，没能正常上大学。这中间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恢复高考之后，我一开始准备报考本科，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数学和物理在全校都是有一点小名气的。可是当地正在把我当中学的骨干教师，我报了名之后，他们偷偷把名字给划掉了。领导不放，我觉得还是瞧得起我，但是也和他们吵了一通。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了研究生招生，他们认为我没读过本科就考研究生，肯定考不上的，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说让你报一次吧。没想到最后就这么个结果。

阿忆：上一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您是一个乐观的人，这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您是一个勤奋的人。第三个问题，简历中没有看到您有关于佛教的信息，没有任何宗教的信息，怎么对宗教感上兴趣了？

陈洪：第一，我祖上都不信教；第二，我本人现在也不是一个教

徒。对于宗教感兴趣有两种：一种就是教内的人，出于信仰；另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对象、学术的对象发生了兴趣。我下乡时书读得比较杂，读了不少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书，所以我当时还差点考了任继愈先生的佛学研究生。好像当时只有他招宗教方面的研究生。我对于宗教的兴趣，主要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学术的对象。

阿忆：好，现在就有请陈教授给我们讲演，题目是《佛教与中国文人》。

陈洪：两千多年前，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和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形成一种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大体说来，有几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不同的层面：一个是纯粹宗教的层面，就是僧人们所秉持，所践履的层面；另一个是着落在大众的、世俗的层面，就是民众在一种含混的宗教心理支配下烧香、祷告、做法事等等，这个层面的文化属性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第三个层面是统治者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帝王以及权贵的宗教态度，特别是宗教政策，这个层面的文化属性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除此还有一个层面，往往为人所忽视，就是文士的“佛缘”层面。文人，通过自己的文化修养，借助于已经有的知识结构，来接受佛教中的某些内容，从而经过一番主体性较强的消化，使其融入自己的思想、生活中。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物，对佛教信从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这种“佛缘”与前三个层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理性色彩较为浓厚，文化内涵较为丰富，调和儒、释、道的倾向较为明显。同时，“佛教”体现在文人的写作之中，转化为一种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因素，从而成为文学史研究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和中国文士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即如何安顿自己的一生，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六朝以后，相当多的士人或从佛教中受到启发，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与人生道路，或从佛教中为自己生存方式找到心理的、观念的依据，所谓“以儒致身，以道养生，以释安心”。另一个方面是一些特立独行之士，在批判僵化的统治思想时，往往从佛教里寻找自己的思想武器。第三个方面，一些文人在从事文学、艺术活动时，从佛教中得到启示，从而产生创新的灵感，影响到创作思想、作品内容与艺术手法、艺术风貌的新变。

说到佛教对于文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一般会想到青灯黄卷、悬崖撒手之类的情景。在人生挫折、失意甚至无路可走的时候，有所谓遁入空门之说。“遁”即逃，当然是对人生的消极应对。但是，也有看来不尽如此的情况。比如说李白，一生狂放，活力四射，而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结归纳，其《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云：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金粟如来，据《净名经义钞》的解释：

维摩诘，此云净名——过去成佛，号金粟如来。

可见李白是把自己的人生比照于维摩诘。而维摩诘是大乘佛教中十分有地位的一个菩萨形象，主要言论、行迹见于《维摩诘所说经》。经中讲：

有长者名维摩诘，……辩才无阂，游戏神通……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

太白诗中写“金粟如来”而及于“酒肆藏名”，表明他不仅认同于维摩诘的人生模式，而且对《维摩诘经》相当熟悉。

而千余年后，龚自珍在《西郊落花歌》中写道：

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

“落花”系用《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第七”的典故，而“最喜”云云则表现出诗人对维摩诘的十分向往。龚自珍也是以狂放著称的文人，这种向往显然不是灰心灭智的表现。

实际上，从李白到龚自珍之间的千余年间，有过类似表白的文士不可胜数。《维摩诘经》对中国文人生态态度与生存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相

当广泛而深刻。

《维摩诘经》在佛教三藏经典中十分独特。其主角不是“佛”，而是居士维摩诘，全书描写维摩诘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他对佛教理论的理解，写得生动、活泼，像是一部多幕剧。维摩诘的形象丰富而复杂：他是个大富翁，“资财无量”“有妻子”“有着属”，家庭美满（据《义钞》：维摩诘之妻为金机，之子为善思，之女为月上）。他还“入诸酒肆”，“入诸淫舍”，讲究穿戴，参与赌博；然而他又具有崇高的人生目的：“以一切众生病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护诸众生”；同时他的佛法修为非常之高，不仅释迦座前的各位菩萨皆不如他，而且个性张扬、举重若轻，所谓“辩才无阂，游戏神通”。

这样一个形象是中土固有文化中未曾有过的。这是一个既乐享人生，又理想崇高；既相容于各界，又张扬个性，唯我独尊；既坚持己见，又游戏三昧的形象。他的生存方式极富张力，对于身处封建皇权与精神追求相冲突之境地的才智之士，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自这部经译到中国来，历代文人中颇多奉维摩诘式的人生为楷模的。比如大家最熟知的王维，姓王名维字摩诘，连起来是“维摩诘”。比如黄庭坚，做诗形容自己，“菩提坊里病维摩”。比如李卓吾，他住的那个地方写了一个横额“维摩庵”。可见，《维摩诘经》所描写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作为一种人生的范型，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有相当的影响。追求“维摩人生”的文人中，最典型的一个当数苏东坡。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古代士人中最为丰富的一个。第一，他是全才，诗、词、文、书、画，可以说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影响很大。第二，人生非常复杂，高官做到礼部尚书，而生活坎坷的时候几次被贬，坐大狱，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一旦处在逆境中，没有机会做事的时候，心态调整得很快。他在被贬官黄州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么写的：“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我好像陶渊明、维摩诘一样生活了。“隐几”是靠在几案上。维摩诘有个特点，就是身体不太好，所以总是称“病维摩”。他自己解释，因为众生生活在病苦里，我要和众生共同体验，所以我尽管神通广大，却不治好自己的病。苏东坡这里也隐含此意：我要和生活在痛苦中的民众一样。“病有妻”，也是很有意思的佛

典，有妻，不是说有太太的意思，经文中讲到维摩诘既修佛法又有家室，可是，又强调说那只是表面，实质上维摩诘是“法喜以为妻”——对佛法的喜悦就像妻子陪伴时一样。东坡在另一首诗里也讲：“虽无孔方兄，幸有法喜妻。”这样，苏东坡“隐几维摩”这句诗就有了双关义，而主旨是说，我有佛法作为一种人生伴侣，一种心理上的支撑和依靠。可见苏东坡在面临着人生沉重打击的时候，选择人生的模式、人生的道路，就从《维摩诘经》中得到启发。不但如此，他不是一般地认同维摩诘这个形象，而且还有很深入的理论思考。他在一首题画家石恪所画维摩诘像的诗里，说“我观三十二菩萨，各以意谈不二门。而维摩诘默无语，三十二义一时堕。我观此义亦不堕，维摩初不离是说”。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对整个《维摩诘经》里所讨论的属于大乘佛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非常有特点的、独立思考之后的一个答案。《维摩诘经》中有三十二个菩萨分别对“不二法门”作出解释，而维摩诘一言不发；因为讲出来就是有分别，就有了“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分别，就不是“不二”，所以不讲话是真的“不二”。但是，苏东坡又进一层，说菩萨们表述的内容也自有其道理在，“语”和“默”也不必强调其分别。可以说，《维摩诘经》不但给他提供了一种人生范型，而且使他深入地思考很多哲理性的问题，启发他在相互矛盾的、复杂的问题之间找到超越的、超脱的角度和方式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东坡一生洒落、高妙，得益于“维摩”之处甚多。

佛教对于中国文人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给他们提供了思想批判的一种“另类”的武器。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个稳定发展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思想禁锢，定儒教于一尊，思想领域一定程度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些有才情、有思想、有个性的文人，当它们要冲决思想的网罗，提出一些新的观点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理论的支撑。有的是从儒学本身产生一些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的“异端”，如王充；有的是回到先秦诸子去寻找一些思想的资源，如《庄子》就经常成为他们的选择；同时，佛教也成为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当一部分有思想的文人，当他们批判统治思想的时候，就从佛教里寻找依据。生活在明中晚期的李卓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明中晚期是

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中国古代有三个思想活跃、个性解放时期：一次是先秦，先秦诸子；一次是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魏晋；还有一次就是明中晚期。明中晚期思想解放的旗帜就是李卓吾。他是非常富有个性特点的人物，他在思想解放方面做的事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虚伪的道学，特别是对于禁锢人们思想的道学的权威地位猛烈抨击；另一个是对当时正在新兴的市民的经济阶层，作为代言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李卓吾的代表著作叫《焚书》，他说我这个书出来之后肯定要被统治者所不容，要把它烧掉，但是我相信还会流传下去。《焚书》里百分之七十的篇章都和佛教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从佛教里得到了很多思想武器，来反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学，特别是所谓“伪道学”。他的《童心说》，提出很大胆的观点，说“《六经》《语》《孟》，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六经》指儒家的经典，和《论语》《孟子》一起成为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柱。可是李卓吾说这些书是道学家欺骗舆论的工具，也是产生伪君子的根源——你看他的胆子大不大？

他所提倡的是童心，那么“童心”是什么？他说是“最初一念，绝假纯真之本心”。关于童心是什么？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它直接的源头是从孟子那里来的，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从更直接的意义上看，它和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这里所说的“童心”，与生俱来，本来清静，进入社会生活就遭到了污染，这其实就是佛教——特别是禅宗，所宣扬的“佛性”。

他把这样的观点用于文学批评，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比如说李卓吾评点《水浒传》，非常欣赏鲁智深，欣赏李逵，这个倒还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说鲁智深和李逵是什么人呢？批了好多“佛”、“真佛”、“活佛”的字。鲁智深和李逵是“佛”，什么意思？李卓吾认为，他们表现的是一种真性情，是不虚伪的，摆脱了一切束缚的袒露。可见李卓吾的思想和佛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并从中得到新颖的理论武器。

龚自珍也是如此。龚自珍有一首诗，说得比李卓吾还直接：“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就是说，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的一家而已，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绝对、至高无上的，唯一的权威呢？他又写道：“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西方大圣书”就是佛经。他的意思是：佛经内容比儒家的内容要广泛，它可以推翻很多儒家的观点，又可

以包容它。当然，这个观点可能不全面，但是龚自珍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的观念，要去找新的思想资源、思想武器，到哪里找呢？从佛教里去找，在当时条件下，无论如何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很多有进步倾向的、思想活跃的、富有个性的人文人，批判僵化的封建思想的时候，往往从佛教得到启发，找到理论武器。

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文学艺术创作当中，佛教给了他们一些灵感、一些启发、一些思路，无论是诗、词、文，还是内容、风格等等，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咱们就说鲁智深这个例子。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一想鲁智深花和尚就是莽汉，倒拔垂杨柳，可是《红楼梦》里有一段薛宝钗看戏的情节，薛说她最喜欢的一段曲文是什么呢？是鲁智深的一段自述，就是那段《寄生草》，道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薛宝钗，淑女的典型，为什么会欣赏鲁智深的一段唱词，这中间的契合点在哪里？实际上鲁智深这个形象，我们细想一想，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的形象，我们读《水浒传》，哪一个人物让我们感觉最痛快，就是鲁智深。一方面伸张正义，有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无所束缚，做了和尚也可以喝酒，也可以吃狗肉，也可以把亭子打倒，也可以把金刚砸毁，也可以把住持和尚拉过来给上两拳，是一个非常的放纵个性、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

有意思的是，在晚明很多文人都很欣赏鲁智深。李卓吾评《水浒传》，大段的文字说“只有鲁智深才是真正的活佛，那些个闭眼合掌的和尚，一辈子也成不了佛”。那么鲁智深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从何而来呢？我们研究下去，就知道和佛教、佛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早期的鲁智深的形象是很简单的，比如《大宋宣和遗事》等等，关于鲁智深就是三两句话：一个造反的、反叛的僧人，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元杂剧里的鲁智深也没有太多思想文化的内涵。现在的鲁智深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通过比较可以知道，他确实受到佛教典籍的直接的影响。《五灯会元》所记狂禅的代表人物——天然和尚，为人行事与鲁智深颇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水浒传》作者在重塑鲁智深形象的时候，头脑里是有天然和尚的影子的，所以就在一个武夫身上增加了这方面的色彩。薛宝钗正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小学课本的解释说这首诗告诉我们认识事物要全面，不要片面地看。这当然也不算错，但是只是表面意义而已。这首诗写出来之后，有名的诗人黄庭坚说，这首诗真是不得了，他说苏东坡“于般若——就是佛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了解甚深，横说竖说，皆得真谛”。黄庭坚认为这首诗的包容很深厚。近代的诗人陈衍说，这首诗里有新思想，未经人道过，那么，到底它深在何处？又与佛教有什么关联呢？至少有一点，它除了“远近高低各不同”之外，它还有后面这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面有很多深刻的人生况味、哲理在里面。王国维有一首词，后面有两句，跟这个很像。他说是“欲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大意是说我们要超脱现实的局限客观观照，要对人生的真谛有透彻的了解，可是我们可能彻底地超脱吗？当你观察的时候，你本身其实仍处在被观察的对象之中。这是一种人生的困境。诗句的意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目，可是它的绝对的真实何在？康德认为这是做不到的，有个此岸和彼岸的悬隔。现代物理的量子力学也讲“测不准”，因为我们任何一种观测都是一种干扰，绝对的客观至少现在看来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从这个意义来说，苏东坡的《题西林壁》大概就不简单是小学课本所说的这种意思。那么这个和佛学有什么关系？和佛教有什么关系？研究苏东坡的人指出，佛教有名的经典《华严经》里有两句偈语，说是“种种差别如沙数，平坦高下各不同”。前一句说在这一微尘里，世界还是很丰富，大大小小的各种区别，就像恒河沙数那样无量多的区别；“平坦高下各不同”，这个句式和东坡的诗句都很像。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说过，说我们老兄，自从读了《华严经》，他的诗文都进入一个新境界。所以，像这样一首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的哲理，它所展现的境界很可能都和他的佛学修养有一定的关联。

不仅是苏东坡这样对佛教持友好态度的文士融佛入文，就是表面上排斥佛教的文人，由于身处社会文化的浓郁佛教氛围影响，作品一样会出现佛门印记。例如最著名的道学家朱熹，为了儒家的思想一统，他是攘斥佛、道的。可是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后面的两句，禅悟

的味道就很浓。当然，也有憎恶佛教的文人，通过文学创作来排佛，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影响，像清中叶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文人进行文学的、艺术的创作时，佛学、佛经里的境界，佛的思想往往给他们一些启示，使得他们的作品显得更深邃、更丰富。关于佛教和中国文人的关系，我就简单地介绍这么一些情况，我想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今天只是“窥豹于一斑”，只能是点到而已。

阿忆：好，谢谢陈教授。下面咱们看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对您的提问。

第一位网友叫做“305的猫头鹰”说，我曾在您的《小说的宗教文化意义》一文中读到，“小说自其构成这个词语之初，就背上了‘小’的限定，古代小说一两千年之间总被视为浅俗之物，难登大雅之堂。20世纪以来，小说终于翻了身，成为文学四体之一，堂堂正正写进了文学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但让猫头鹰不明白的是，21世纪到来的时候，小说竟让卫慧、绵绵等人占了上风，古代小说被视为浅俗之物，难登大雅之堂，而卫慧的小说竟是登了大雅之堂，其实那才是浅俗之物，因而危害极大。陈校长，您还有心思研究古代佛法，还不赶快批评批评这些猥亵的所谓“美女作家”！话说得很重。

陈洪：对这个问题，我有点抱歉了。因为有关卫慧的争论情况我知道一些，但是她的小说我没有读。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术业有专攻，我的专业不在此；另一方面我的其他事情多一点，没有读。所以，我的发言权不是很多。但我毕竟和其他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小说这个事情，本身就带有两面，古代小说也有相当一部分格调比较低，或者文学的层次不是很高。我这本书说“浅俗之下的厚重”，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并不排除作为一种通俗的读物，它是有很浅俗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现象，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很多意义，内涵可能是很丰厚的。就像卫慧这样的“美女作家”，即使我们不喜欢她的作品，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出来这种作品，而且流行？她给我们的文化启示可能也是相当多的，是值得研究的。

阿忆：您给我说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陈洪：你这个追问很厉害的。我想比如说是不是和现在浮躁的社会

风气、社会心理有关？另外，是不是也和所谓的后现代的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关联？从中可以透射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例证、个案，是不是它有这种文化的，认识的价值？当然，这不是论断，只是推测，因为我毕竟没有读她的作品。

阿忆：下一位网友叫“锡东刀客”说：“我小时读吴承恩的《西游记》，最恨的就是唐僧。长大了以后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对唐僧更是恨上加恨，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无论是吴承恩还是周星驰，非要把历史上堂堂正正的玄奘，编排成一个迂腐到可气地步的和尚，是不是知道人家反正没有后代，无法控告咱们侵犯名誉权。陈教授作为文学批评家，您认为有必要通过歪曲唐僧来增加《西游记》的艺术性吗？”

陈洪：这个事儿也是太复杂了，如果吴承恩坐在对面，我可以和他讨论。

阿忆：您就假装我是吴承恩。

陈洪：好，假装您是吴承恩，我有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要做的就是《西游记》的传播和演变，其中就要从《西游记》之前，一直做到《大话西游》和《悟空传》，说在不同的时代，故事和人物形象是如何在变化，而这个变化又如何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关于唐僧这个形象，我想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小说，特别是古代的通俗小说里都要有被戏弄的、被嘲笑和尚的形象？这是很普遍的，不但是一个唐僧而已。就是民众，特别是小市民，他们对于宗教有一种嘲谑的内心冲动，他们需要把它丑化，要把神圣拉到地面上来。在这方面，应该说唐僧被丑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他道德上仍然很自律，无非就是迂腐而已。

阿忆：所有的女人都不能近身。

陈洪：小说它要流传，要迎合民众的心理，需要这样一个形象。另一方面，它的主角是孙悟空，作为艺术表现它要有一个对立面，假如唐僧也是一个高手，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俩人就顺色了，没法表现。再一个方面呢，唐僧这类形象，在不同的小说里，他是一种人物范型。唐僧和《水浒传》里的宋江实际很有可比性，还有《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都是表面上处在舞台中间，是一个很正大的、道德的典范，但

是被艺术化处理之后，我们从心理上不喜欢他，这是一类人物。所以和历史上的原型没有关系了，他是一种艺术创作所产生的人物形象。

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看：历史上那个既虔诚自律又勇于奋斗的玄奘，在进入文学世界时，被艺术地一分为二，裂解为虔诚自律的唐僧和勇于奋斗的孙悟空——这样处理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是可以举出若干的。

阿忆：吴承恩坐在这里是顿开茅塞，可能我当时就真是这样想的。

观众：您今天讲的主题是“佛教与中国文人”，但是我听起来，好像您说的大多都是佛教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否中国文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呢？

陈洪：刚才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的这些表现，所言所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上的传播、发展进程。除此之外，大家知道佛教分成好几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佛教的发源地在印度，而印度在13世纪之后，基本上佛教已经灭绝了，所以佛教在近一千年来，真正的中心是在中国。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僧人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人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的宗派——禅宗，基本上文人和僧人起的作用各占一半。再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净土宗，它的理论著作中，柳宗元的著作就收入到他们的典籍当中。袁中郎也做过《西方净土论》，是被视为净土宗重要的理论著作。中国文人无论在日常活动当中，还是在专门的、专业的层面上，都对佛教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佛学。

观众：您刚才谈到了鲁智深，我想这个可以算做佛教的文化对文学作品的正面影响，那么有没有相反的例子呢？

陈洪：我只讲了这个问题的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一面通常被人们忽视，当然，问题很复杂，肯定有消极的一面。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作为人生的一种选择上都有消极的一面，创作当中也有消极的一面。《西游记》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妖魔的形象，和各种的妖怪都不一样，就是牛魔王。大家细想一想，牛魔王和别的妖怪哪里不一样呢？第一，他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家庭、朋友的圈子，大太太、二太太，他“包二奶”在外面，有弟弟，有侄子，有好朋友，有结拜兄弟；第二，他又好气、又好

酒、又好色，非常富有俗人的气息。这个形象还有一个独特点，就是最后它被降服也很奇特，是被如来派出十万“佛兵”，降服之后，化为一头大白牛，牵归佛座前交旨。没有任何一个妖怪是这样的。“大白牛”这个形象在佛教里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的意义，比喻一种超脱，得到一种解脱，比如说“乘大白牛车”，就比喻使人脱离苦海的大乘佛法等等。佛教里有关牛的描写很多，牛车、牧牛等，都有修身养性、脱离欲海的意思。所以牛魔王这个形象，它的一种深层的含义，就比喻一个沉沦在欲海里的凡夫最后被解脱，给救拔出来。当然，这个含义我们通常读不出来的，只读着牛魔王这个形象觉得很有意思，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对佛教有一定了解的人，会读出深刻的含义，你一点不了解，他就是个生动的文学形象。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就是比较成功的。

可以和他做比较的，同时代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叫《西洋记》，一百多万字，写郑和下西洋，其中主角也是一个高僧，有点像玄奘，中间也降服了一头青牛精。写青牛精，把佛教关于牛、牧牛、白牛的象征意义的大段文字，一字不差地抄进来了，但是作为文学形象并不成功，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它。所以如果把佛教、佛经或者其他很教条、很理念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生吞活剥直接塞进去，肯定不会成功。我想这可以说是反面的例证。

阿忆：听完您这个讲话，我开始喜欢牛魔王了。

观众：您刚才讲到佛教对于古代中国文人来讲已经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演化为一种人生的哲学，思想批判的方式，乃至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法，那么这个意义上的佛教，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讲，意义又何在？我还想问，您作为一位知名的中国文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中，佛教对您的影响又在哪里？

陈洪：这个问题是单刀直入。单刀直入这个词也是禅宗里的词，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很锋利、很锐利，不是很好回答的。我想时代在变化，传统意义的佛教直接地对于今天多数的中国读书人，或者广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肯定不像古代的佛教和文人的这种关系了。说现在的一个科学家，他一定要去读两部佛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没这个必要。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但是时代在变化，宗教也在变化，20世纪初有名的僧人太虚法师，就提出了“人

间佛教”这样的一种观念，后来有很多的门下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无论是在佛教的发展上，还是在佛教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上，都做出了很多可以印合时代节拍的事情。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首先，对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它的丰富性、复杂性，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不能简单化来看。其次，涉及到宗教、文化，它的传承、批判、扬弃和发展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理解得透彻，处理得好，对于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是会很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教徒，我不信佛教，也不信道教、基督教，但是我对各种宗教文化现象都有浓厚的兴趣，在研究中都受到过多方面的启示，无论对我的学术修养还是对人生体认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益处。我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同的信仰之间，彼此首先要尊重，敬人者然后人敬之；然后要尽量地相互了解、理解。要化文明冲突为文明互补——当然，谈何容易啊！

观众：说到“文明互补”，我想起《西游记》一类的书中，常常讲到“三教合一”，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陈洪：中国有一道相当独特的文化景观，就是所谓“三教合一”。日前我到南岳衡山。衡山对于佛教与道教都是重要的“圣地”。五岳之说本就与道教的神仙体系密切相关，而“南岳门下”更是禅宗一条极为重要的支脉。所以，在衡山同时看到两教的内容，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是，我还是吃了一惊。在衡山脚下的南岳主庙中，南岳的主神道装而称“菩萨”。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大主庙套小庙，衡岳的道观之中，西侧一溜摆开是八座佛寺，与东侧八座道观（观中观）对应而和谐。同行的外国朋友不解地问：“他们的主张一样吗？他们信奉的神一样吗？”我一时语塞。

其实，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只是一般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罢了。记得当年去武当，过了财神庙将到金顶峰的路旁，有一个别院，其中一座敞殿，平行地供奉着吕祖和观音。至于少林寺的壁画为二十四孝图，更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这种情况，在满世界嚷嚷着“原教旨”的时候，更显出它的独特，以及某种好处。